



胡安·赫尔曼

1月14日,当代阿根廷著名诗人胡安·赫尔曼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3岁。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于1930年5月3日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父母都是乌克兰籍犹太人。他的父亲何塞·赫尔曼曾积极参加1905年俄国革命,为逃避沙皇追捕,曾流亡国外并到过阿根廷。1928年,由于对托洛茨基被流放阿拉木图感到气愤,对斯大林的独断专行感到失望,何塞·赫尔曼决定移民国外。1929年底,他们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二年,胡安·赫尔曼出生,他是家中惟一的阿根廷人。

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上,胡安·赫尔曼一直在为寻求真理、维护正义而斗争。他是诗人,更是战士。他15岁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入大学化学系,但后来放弃化学专业,因为他的志向是诗歌创作。他做过卡车司机、推销员等工作。1954年,他成为《我们的话语》和阿根廷共产党报刊《时刻》的编辑,同时任驻中国新华社记者。

胡安·赫尔曼曾于1960年和1964年先后两次来华访问。在第二次访华时,他提出“重走红军长征路”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为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分裂,胡安·赫尔曼曾被阿根廷共产党要求放弃新华社的工作,但他坚持选择留在新华社,脱离了阿根廷共产党。一个月后,他被阿根廷共产党开除,但他对此颇不以为然。

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牺牲,极大地推动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赫尔曼决定参加“革命武装力量”,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大概都依稀记得,当时拉丁美洲的城市游击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胡安·赫尔曼参与创建了城市游击队。1975年, he 被当时阿根廷反共联盟判处死刑,不得不流亡国外,从此开始了13年的流亡生涯,奔走于罗马、马德里、马那瓜、巴黎、纽约、墨西哥城之间。1979年,由于政见不同,反对军事冒险,他又被阿根廷城市游击队通缉并判处了死刑。在流亡期间,赫尔曼从未停止过反对军事独裁、维护社会正义的斗争,阿根廷军政府也从未停止对他的迫害。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的儿子和怀孕7个月的儿媳“失踪”并最终遇害。诗人遭受的迫害在国际上引起了公愤:包括法国总统密特朗和瑞典首相帕尔梅在内的欧洲政要曾于1976年在法国《世界报》上联名批评阿根廷军事独裁的倒行逆施。

## 胡安·赫尔曼：一位传奇式的诗人

□赵振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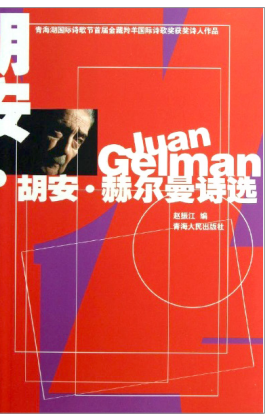


胡安·赫尔曼的部分诗集作品

止对他的迫害。1983年12月10日,阿丰辛政府结束了军事独裁,但并未给他平反。1986年2月,还对他进行过缺席审判。许多拉丁美洲的著名作家,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奥克塔维奥·帕斯、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爱德华多·加雷亚诺、罗阿·巴斯多斯等人都在他表示了声援。直到1988年,他终于能合法地回到阿根廷。此后,他一直与妻子马拉居住在墨西哥。

在流亡期间,他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翻译,在全部300名译员中,他位居次席。2000年,在乌拉圭总统的帮助下,他终于与自己从未见过的孙女团聚,并成了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市的荣誉市民。

胡安·赫尔曼从8岁开始学着写诗,11岁在一本名为《红与黑》的刊物上发表了第一首诗作。毫不夸张地说,在几十年不屈不挠的人生历程中,诗神缪斯始终不离不弃



表了约40部诗集。

在赫尔曼的诗歌创作中有两个关键词:执著与创新。执著是对诗歌的痴迷,创新基于不懈的追求。在谈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赫尔曼说:“创新往往以痛苦的方式开始,因为一方面要打破由以往的执著所积累下来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寻求新的、与以往不同的执著。在掌握新的表现工具的时候,原有的执著会熄火。

在我的写作中,这几乎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其中也有低潮,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因为写诗不是想写坐下来就能写的。”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在秘鲁诗人塞萨尔·巴略霍的诗歌中找到了自己口语化的风格,像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和尼加拉瓜诗人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一样,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具有个性化的诗歌元素,同时借鉴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的表现形式,开创了一条对语言和社会具有双重意义的诗歌创作之路。正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金藏羚羊奖授奖辞所说:“他的创作,以朴实、精练的语言,丰富、深邃的意象,体现并捍卫了诗歌与人的尊严。”

赫尔曼曾获多种奖项,其中较重要的有阿根廷国家诗歌奖(1997)、胡安·鲁尔福文学奖(2000)、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诗歌奖(2004)、聂鲁达诗歌奖(2005)、索菲娅王后奖(2005)、塞万提斯文学奖(2007)。

胡安·赫尔曼是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颁发的首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得主。作为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委会中惟一研究和翻译西班牙语诗歌的委员,我有幸推荐了他,并在诗歌节期间,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9年,他两次来华,数次朗诵自己的诗篇,都是我翻译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他对我译文的表示认可。有一次,他很认真地说:“作为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我在新德里、马尼拉、东京和北京的塞万提斯学院朗诵过诗歌,每次都有译者用各自的语言朗诵译文,我虽然听不懂,但凭感觉,我觉得只有你翻译的是诗。”作为好朋友,他的话同他的人格一样,对我永远是一个鼓舞和鞭策。

地陪伴着胡安·赫尔曼。诗歌是他战斗的武器、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寄托。1954年至1955年,他和一些青年伙伴(多是共青团员)一起,创建了“硬面包”诗歌小组,可见他们把诗歌看作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食粮。这个小组于1956年出版了开山之作《小提琴及其他问题》,这也是胡安·赫尔曼的第一部诗集。诗集出版后,很快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从那时起,他白天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晚上进行诗歌创作。据不完全统计,他共发



《列夫·托尔斯泰——逃离天堂》俄文版

巴维尔·巴辛斯基

2010年11月,在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之际,第五届俄罗斯大书奖颁给了以描写这位文坛巨匠的出走之谜为主题的传记小说《列夫·托尔斯泰——逃离天堂》。

小说共有十章和一个尾声。每章都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后的经历引出一个与之相关的主题。第一章“离开抑或逃跑?”分析种种出走原因。第二章“失去的天堂”分析来往于托尔斯泰庄园的亲友以及各种崇拜者。第三章“索涅契卡和恶魔”由家人尤其是妻子索菲亚对托翁出走的反应,讲述托翁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第四章“包发帽里的头”分析托翁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第五章“新俄罗斯人”描述托翁的教会历程。第六章“亲密朋友”讲述了托翁在不同阶段交往的密友,包括备受争议的切尔特科夫。第七章“谁之错”分析托翁与妻子之间的分歧。第八章“漂亮神像”分析托翁晚年助手切尔特科夫。第九章“逐出与遗嘱”分析托翁晚年对宗教的复杂态度和他立过的几份遗嘱。第十章“冰雨”描述了托翁去世的经过。尾声描写的是托翁葬礼和索菲亚的余生。

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出走与离世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一大事件,也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坛的百年谜案,相关研究与著述早已汗牛充栋。那么21世纪的这本传记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首先,作者巴维尔·巴辛斯基的叙述方式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部作品力图真实、客观地还原当时场景、事件经过及相关人物,几乎不做任何主观判断,更没有给出任何的结论,被评论界称为“昔日重现”,连作者自己也承认这本书“像是一场真人秀”。书里保持对托翁及其妻子的客观态度,没有指责单方面的错与对,简单辨明黑与白,而是摆出事实,带领读者一起去分析与感受,把结论与评价留给读者去做。读者仿佛与作者一起经历了一次文学的侦探之旅,并且经由它而考察了托尔斯泰的整个一生。另一方面,作者又是一个掌握一切的作家,有时还是一个叙述者。托尔斯泰、索菲亚、萨沙、切尔特科夫都是小说中的人物,巴辛斯基甚至说出了这一点:“这里切尔特科夫的形象有点具有恶魔特点,完全符合他的名字(这个名字的词根是‘鬼’的意思——笔者注)。他不只是一个人,一个资深的活动家、翻译家、出版家、收藏家,而且是一个鬼,陪伴在托尔斯泰和索菲亚身边……”

第二,与上面一点相连的就是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史实资料,由此被称作“non-fiction”,即“非虚构”。日记、回忆、书信、电报、报刊文章等档案材料或者独自构成作品的一部分,或者被有机地穿插在叙述之中,丰富而生动,全面而有序。书中还有大量珍贵的档案照片和真实描绘当时场景的油画:有托尔斯泰和索菲亚的结婚照片,他们不同时期的家庭合影,列宾为好友切尔特科夫所作的画像,1909年托翁和切尔特科夫在办公室的照片(切尔特科夫是惟一一个在托翁工作时有权进入此屋的人,甚至连索菲亚都没有这个权利),瓦尼亚奇卡的照片(托翁夫妇最小和最喜欢的一个孩子,1895年6岁时去世),三代列夫的照片,托翁和农民在一起的照片(里面的他俯身抚过农民的孩子),托翁给自己的孙子孙女讲童话的照片等等,不一而足。有一幅油画最令人心碎:妻子趴在托尔斯泰去世的小屋窗外在焦急地守望。下面配了一段他们儿子的回忆文字:“她衣着凌乱地伏在父亲将要去世的那间小屋的外面,想听一听、看一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一个有罪的女人,深深地内疚着,委屈着,悔恨着……”

第三,同时展现托尔斯泰的伟大和平凡两个方面。在作者笔下,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拥有独一无二的眼光与思维的天才;另一方面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有着自己生理的需求和人性的弱点,是带着各种欲望的接地气的人,远非过去时代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的理想化的托尔斯泰。

作者把对托翁生命中最后10天的细致描写与对他整个一生的回顾相交织,突出刻画了这位伟大人物的婚姻生活。在关于托尔斯泰与妻子的关系上,作者表现出对二者公允的态度。书中的索菲亚是个幸福的牺牲者,她既是这个庄园里聪慧而有修养的女主人,又是一个经常处于怀孕状态、接连失去几个孩子的伤心母亲,同时也是对一个丈夫的初恋情人为其非婚生下孩子忍辱负重的妻子。她既要为作家丈夫照顾起居,誊抄文稿,又要忍受种种琐事带来的不快,还要为了争夺自己的天才丈夫而与其亲密助手切尔特科夫进行痛苦的斗争。最终由于托尔斯泰不能忍受普通大众受屈辱的生活地位,提出放弃私有财产的主张,索菲亚实在无法接受,所有的冤屈与嫉妒、焦虑与愤恨积累起来,终于爆发,由此也产生了她个人的和托尔斯泰的悲剧。妻子想和丈夫在一起,丈夫却想和上帝在一起,结果,伟大的作家在一个莫名的小车站去世,想见自己的妻子却又不敢见她,而妻子见到丈夫后说出的惟一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读者在这样的阅读体验中会深深感叹:做天才才是幸福还是痛苦?当我们感谢上帝赋予俄罗斯一个列夫·托尔斯泰的时候,也会深深同情背负了半生十字架的作家本人,更同情那个陪伴天才的妻子。作者没有指责任何一方,而是向读者展示了列夫·托尔斯泰和妻子这两个互相折磨的人,这两个经常被公众包围却又极其孤独的人,这一对深爱着对方却又彼此害怕的夫妻。

本书描写的另一个焦点是列夫·托尔斯泰与教会的关系。这位与俄国教会冲突最激烈的作家却与教堂有着血缘般的隐秘联系。托尔斯泰最后从自己的庄园逃到教堂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这是托翁惟一一次自由遵从内心的选择,他的所有其他行为都有人记录,他被索菲亚、切尔特科夫、托尔斯泰主义者、追随者们撕扯着无力反抗,而他最后做出的选择就是他最想留下来的地方,所以说,列夫·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寻求上帝。

“大书奖”是近几年俄罗斯新兴的一个奖项,因为高额的奖金而迅速具有了相当的知名度。这个奖项特别偏爱传记类作品。《列夫·托尔斯泰——逃离天堂》一书和前几届获奖作品德米特里·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以及阿·瓦尔拉莫夫的《阿列克塞·托尔斯泰》一样,都是通过描写一位杰出作家的一生来展现整整一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一段值得研究和珍存的历史财富。

《列夫·托尔斯泰——逃离天堂》的作者巴维尔·巴辛斯基生于1961年,是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院院士。他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1981年开始在《文学报》《我们的同时代人》《新世界》《十月》《旗》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现任《俄罗斯报》文化版主编。在获奖感言中,巴辛斯基笑称妻子曾经抱怨他“对托尔斯泰的家人比对自己的孩子了解得更多”。不过,辛苦的付出换来了空前一致的好评,读者盛赞这个文学大奖果真名不虚传,庆幸在当今这个时代还能拥有这样天才的作家。

## 客观重现天才作家的一生

□侯玮红

### 瞭望台

### 《一座桥的诞生》:

## 以建桥勾勒社会缩影

□安 宁



梅丽斯·德·盖兰嘉尔



法国女作家梅丽斯·德·盖兰嘉尔的近作《一座桥的诞生》曾获得法国美第奇文学奖、弗朗茨·黑塞文学奖,并入围龚古尔、费米娜和花神等文学奖名单,是很值得一看的作品。全书的内容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建桥,内容很切题,而且作者对建桥的描述可称得上是不厌其烦,列举大量数字和使用技术名词,营造现实主义氛围,令这部虚构的小说特别具有报告文学的味道,即使对建筑一窍不通的人,在看过书后恐怕也能凭记忆说出一座吊桥的建设需要哪些步骤,甚至列举出一些工种和工艺细节了。

幸运的是,它讲的不只是建桥,还有这座桥周围的一切——也就是背后的人和社会。书中人物繁多:作品中的社会背景是虚构的建桥所在地可卡市,人物涉及法国中标公司外派的工程经理狄德罗、负责混凝土的戴门提斯和吊车司机桑丘,远道而来为生存而加入工程队的中国工人莫云、美国工人索伦·克莱、美国女工凯瑟琳和两个本地的印第安少年,以及可卡市长“蟒蛇”、俄罗斯女人夏奇拉、印第安文化的维护者雅各布等等,作者通过全面又不失重点的叙述展现了我们生活的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缩影。

作品的气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很

符合作者将其定位为现代史诗的创作初衷。谈到气势,其实包括了力量、繁杂的细节和厚重。书中的建桥工程吸引了全世界形形色色的人涌向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可卡市。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建桥人员以外,“还有一支人声鼎沸的随行队伍,他们中有卖烧鸡的、牙医、心理学家、理发的、卖匹萨饼的、抵押放款的、妓女、给证书做塑料膜的、修理电视和多媒体电器的、大众作家、按斤卖T恤衫的、治疗鸡眼的桂树膏药和灭虱油的制造商、牧师……”法国书评大都将这部作品归为“自然主义”文学流派,自然主义擅长的细节描写可在作者对大河、吊桥建造的描述中真切感受到,从可卡市的创建(欧洲传教

士、拓荒者)到发展(淘金热和移民潮),从地形到居民组成(印第安人、本地白人、移民等),从城中大河的两个堤岸到两个社会结构,作者通过详细生动的叙述营造出一个热闹非凡、罪恶与繁荣共存的花花世界,充满嘈杂的生命力,加强了作品的厚重感和对主体社会背景的信服力。作者在语言上也别具匠心:简略的句子结构与插入语混搭,标点(特别是插入语的引号)的精巧加强了陈述的气势、自然节奏和立体声效果,却也因此让一些读者在一开始感到阅读困难。作品用词上的庞杂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点:如在正常叙述中混入建筑专业词汇、动植物名词,插入骂人话或俚语,以达到震撼甚至荒诞的效果。我认为,该书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者在创作上所表现出的胆识、开拓精神和独特的写作技巧。

“桥”这一意向极具象征性,它代表连接、沟通、打破封闭、融合,甚至妥协,在某种程度上,“桥”及其建造过程表明了当今世界的总趋势。来自不同民族、国籍、社会背景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同一工地,建筑一座桥——可以以此类推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产制造背后所汇集的劳动人群;

建桥过程突显出发展与传统的矛盾(印第安或本地文化被整齐划一的外界文明蚕食而逐渐萎缩)等,都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前所未见的情况。作者对此进行了客观讲述,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例如,作者对与主体情节无关的菲律宾宾泊生不惜笔墨:“他在这个地方站了7年了,身着硬挺的制服,后脑勺上顶着饰带装饰的橄榄帽,他移民到可卡7年了,7年,掐指算算,想象这是怎样漫长的历程,夹在他护照封皮里老婆孩子的脸已经泛白,每个月往村子汇款,用剩下的工资租住在一间没有窗子的普通阁楼里,极少会有女人来,坐在电视机前嚼着甜橘子,每天只说30个词,但同一个词要重复100遍。”这让人联想到作者是在重提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这在当今来看有些过时、反潮流,但却是真实存在、日益普遍的问题。文中大量使用“嵌套”和“节外生枝”的叙述方法,也就是在故事中套故事,加强文字的客观真实感和镜头感。

作品的另一个新奇之处在于并无典型人物形象,作者在很多地方都明显刻意

使主要人物“不完美”。例如小说开篇便大篇幅地充分展开对狄德罗的描写,将其塑造为小说主角,但文中随处可见狄德罗诸如“糟糕的牙齿”、“这个将人生归结于与世沉浮、随波逐流的男人”一类的负面形容,这或许是出于作品客观真实的需要,却也让小说的可读性有所减弱,特别是缺乏内心刻画,读者难以通过文字对主人公进行自我投射,得到自我实现的快感。作者坦言其创作以物质世界和机体感官体验为主(声、光、气体质量、地理位置),这似乎与她笔下的狄德罗(“通过内省获得的经验与我无关,我要的不是反思,而是突破,我喜欢的是撕扯破裂的感觉”)有共通点。

作者的幽默感也是作品的一个亮点,那不是让人捧腹的笑话,而是一些引人思考的嘲讽,虽然荒诞却很合情理。如“蟒蛇”竞选市长获胜后所做的决定:“然而新的官职为他打开的受贿之门所展现的平静而优越的养老美景并不能令他满足,他心中陡然生出一个宏大的志愿……站在这个对他来说像个可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天桥上,他轻声念出这些语句,想象着配合的手势,而慢慢被他自己的言辞感染,被他向大众许下的承诺所征服,热血涌上头顶,激动的心猛烈跳动:他要成为他自诩的那个人,就这样决定了。从此,他只将财富当作获得他人尊敬的有利工具,他惟一的愿望就是留下痕迹,让人们记得他,让自己名垂青史。”



俄罗斯画家列宾绘列夫·托尔斯泰像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